

云 南 青 铜 器 论 丛

《云南青铜器论丛》编辑组 编

文 物 出 版 社

封面题签 林散之

云南青铜器论丛

《云南青铜器论丛》编辑组 编

文物出版社出版

北京五四大街29号
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1/16 印张:13.5 插页:11

1981年2月第一版 1981年2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11068·803 定价: 3.60元

目 录

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	冯汉骥(1)
——若干主要人物活动图像试释	
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	冯汉骥(17)
“滇”人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	汪宁生(42)
——晋宁石寨山文物研究之一	
试释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片上的图画文字	林 声(68)
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	王大道(77)
滇西青铜文化初探	张增祺(92)
试论中国古代铜鼓	汪宁生(108)
云南出土铜鼓源流考略	李伟卿(144)
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	童恩正(156)
朱提堂狼铜洗考	孙太初(178)
云南古代的铜铸艺术	李伟卿(192)
云南青铜器铸造技术	曹献民(203)
编 后 记	编 者(210)

CONTENTS

Feng Hanji:

- A Study of the Bronzes Excavated at Shihzhai Shan in Jinning
County, Yunnan Province (1)

- An Attempt at Identification of the Relics Unearthed at Shihzhai
Shan in Jinning County, Yunnan Province (17)

Wang Ningsheng:

- Economic and Social Life of the People of Lake Dianchi Area in
Yunnan Province (42)

Lin Sheng:

- An Approach to the Deciphering of the Pictographic Characters on Bronze
Slabs from the Shihzhai Shan in Jinning County, Yunnan Province (68)

Wang Dadao:

- Bronze Cultures of the Lake Dianchi Area in Yunnan Province (77)

Zhang Zhengqi:

-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Bronze Culture in the Western Part
of Yunnan Province (92)

Wang Ningsheng:

- Notes on the Ancient Chinese Bronze Drums (108)

Li Weiqing:

- The origin of Bronze Drums Excavated at Yunnan (144)

Tong Enzheng:

- Bronze Swords in South-west China (156)

Sun Taichu:

- Bronze *hsi*(basin) Unearthed in Zhu Ti and Tang Lang (178)

Li Weiqing:

- The Artistic Achievement of Ancient Yunnan Bronzes (192)

Cao Xianmin:

- The Method of Bronze Casting in Ancient Yunnan (203)

Editor:

- Postscript (210)

图 版 目 录

图版壹

- 1 晋宁石寨山6号墓（滇王墓）随葬品出土
- 2 德钦永芝石棺墓发掘

图版贰

- 1 杀人祭柱场贮贝器盖（晋宁石寨山M1）
- 2 杀人祭柱场贮贝器（晋宁石寨山M12:26）

图版叁

- 1 战争场面贮贝器盖（晋宁石寨山M13:356）
- 2 杀人祭铜鼓场面贮贝器（晋宁石寨山M20:1）

图版肆

- 1 纺织场面贮贝器（晋宁石寨山M1）
- 2 纳贡场面贮贝器（晋宁石寨山M13:2）

图版伍

- 1 四牛骑士贮贝器（晋宁石寨山M10:53）
- 2 牛虎鹿贮贝器（江川李家山M22:21）

图版陆

- 1 执伞俑（晋宁石寨山M13:227）
- 2 执伞俑（晋宁石寨山M6:121）
- 3 五立牛针线盒（江川李家山M24:35）
- 4 立牛尊（江川李家山M17:33）

图版柒

- 1 立牛壶（江川李家山M18:2）
- 2 虎牛案（江川李家山M24:35）

3 虎噬牛枕（江川李家山M17:12）

4 立兔杖头（晋宁石寨山M19:2）

图版捌

1 飞鹰杖头（晋宁石寨山M20:1）

2 洗（昭通地区出土）

3 水鸟捕鱼扣饰（晋宁石寨山M21:23）

4 立鹿（晋宁石寨山M17:6）

5 铜棺（祥云大波那出土）

图版玖

1 镊（晋宁石寨山M5:31）

2 镊（楚雄万家坝M1）

3 斧（昌宁新街出土）

4 弩机（江川李家山M3:61）

图版拾

1 戈（江川李家山M21:67）

2 戈（江川李家山M13:24）

3 剑（晋宁石寨山M6:21）

4 剑（德钦永芝M2）

图版拾壹

1 剑（江川李家山采:58）

2 箭箙（江川李家山M24:88）

3 臂甲（江川李家山M13:4）

4 吊人矛（晋宁石寨山M6:84）

5 狼牙棒（江川李家山M24:16）

6 叉（晋宁石寨山M3:11）

图版拾貳

1 豹耳矛（晋宁石寨山M13:199）

2 斧（晋宁石寨山M12:7）

3 斧（江川李家山M13:21）

4 斧（晋宁石寨山M13:209）

5 斧（晋宁石寨山M1:17）

图版拾叁

1 铜鼓（祥云大波那出土）

2 铜鼓（楚雄万家坝M1）

3 铜鼓（江川李家山M24:42）

4 铜鼓（晋宁石寨山出土）

图版拾肆

1 盘舞扣饰（晋宁石寨山M13:38）

2 乐舞扣饰（晋宁石寨山M13:65）

图版拾伍

1 献俘扣饰（晋宁石寨山M13:109）

2 缚牛扣饰（晋宁石寨山M6:30）

图版拾陆

1 缚牛扣饰（江川李家山M14:2）

2 祭祀扣饰（江川李家山M24:90）

图版拾柒

1 猎鹿扣饰（江川李家山M13:7）

2 猎猪扣饰（江川李家山M13:8）

图版拾捌

1 二兽噬鹿扣饰（晋宁石寨山M6:107）

2 三虎背牛扣饰（晋宁石寨山M12:38）

图版拾玖

1 二怪兽扣饰（晋宁石寨山M13:45）

2 斗牛扣饰（晋宁石寨山M6:41）

图版贰拾

1 人物屋宇扣饰（晋宁石寨山M13:239）

2 人物屋宇扣饰（晋宁石寨山M6:22）

3 人物屋宇扣饰（晋宁石寨山M3:64）

图版貳拾壹

- 1 曲管葫芦笙（江川李家山M24:40）
- 2 提梁壶（呈贡小松山M1）
- 3 伞盖（江川李家山M18:10）

图版貳拾貳

- 1 圆形舞人扣饰（江川李家山M24）
- 2 圆形猴边扣饰（晋宁石寨山M6:16）
- 3 昭明镜（晋宁石寨山出土）
- 4 百乳镜（江川李家山出土）
- 5 滇王金印（晋宁石寨山出土）

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

——若干主要人物活动图像试释

冯 汉 骥

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若干铜器上铸有、或镌刻有许多当时人们的活动图像，在一个场面中少的十余人，多的有达一百二十余人者，情况是相当复杂的。此类图像，在发掘报告中仅作了一些简明的叙述，有者未加解释，或阐释不足。但这类资料，不仅是考古学上所少见和近十年来国内考古学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。而且是当时“滇人”重要活动的最真实的写照。若能对它们作出正确的解释，对于当时滇池地区的生产活动及社会习俗的阐明，当有极大的帮助。作者不揣谫陋，作为试释，聊供参考。

一 “祈年”、“播种”

贮贝器M20：1 盖面铸有一相当复杂的场面，在《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》（以下均简称《报告》）中定为“杀人祭铜鼓场面”^①。从表面上看，此一图景中“铜鼓”固为最明显的现象；但若进一步考察，其间似乎尚含有另外的重要意义。

此一图景，很明显的可以分为两个部分，其间不仅有极明确的分界线，而且在布局的位置上，亦各有相当的距离（图版叁，2）。大致上以器盖的双耳为中线，器盖左边系以“祭祀”为中心，参加者共有十八人（包括被牺牲者在内），其中各人的动作，似皆围绕此一中心而来。此一部分在《报告》中已详加叙述，兹不赘。

器盖的右边，一行共十六人（其中抬肩舆的四人中一人已断失）^②。其中虽有坐肩

① 云南省博物馆：《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59年，76—77页。

② 在《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》）图版照像时，其上的人物似尚未修补齐全，故本文内共言三十四人（包括已失落的抬肩舆者一人在内），而《报告》中仅言三十二人。在《报告》图版伍柒右边前导的一骑在照像时方向似反置。

舆^①、有骑、有步，而面向均为一个方向，有如出行者然。最前一骑前导，后随步行者一人，肩荷在《报告》中所称的“铜犁”^②。此二人均为男子。后为四人抬肩舆一乘，抬舆者皆为男子，舆中坐者当为女奴隶主，通身鎏金，背拖大髻，首略向右而俯视其前面跪于地上者。

舆左紧随一人，头已失，左肩负一编织之大囊形物，囊由左肩出于右下，于胸前以右手扶之。其后随一女子，双手拱起而注视舆中之人，腰中缠一宽带。此人之后一女子箕踞于地，左置筐以左臂挽之，筐中盛食物，右手执盂。此或为于途中迎谒及进饮食者。此踞地者之前右有一行动女子，左手前伸，右手执二圆形铤，倚于肩。铤之上部似已断缺，或为工具。舆后靠右随一骑；舆后随三人皆为女子，右者双手捧桶形器，左者右手执一大棍，棍的下端似有断失，亦可能为工具。此二人之后随一人，头顶巨筐，以左手扶之。

这一群人物的活动，必有其特殊的意义。自其中各人活动的情况来看，如有荷“铜犁”者，执杖（此亦可能为农业工具）者，负囊顶筐者（其中所贮可能为种籽），可能系一前往播种仪式的图景。再者，若将此一图像与贮贝器M12：2 腰部所刻图景合而观之，其意义则更为明白。贮贝器M12：2 腰部之图景（此系铸于圆形器上首尾相接的图，《报告》的图版自其破裂处分割，致使其意义不明。今参考M20：1 图分割如图一，2），在《报告》中以为“似巡狩之图”^③，若如《报告》所言，肩舆中皆为女子，则“巡狩”之解释似为不当，因“巡狩”应为“滇王”之事，而非女奴隶主之事。细察此图，亦为一种前往播种的仪式图景，与前面所述贮贝器M20：1 盖上的活动是相同的^④。兹将其描述如后。

首一人为女子前导，其后一女子肩荷“铜犁”，后一女子头顶一大筐，其后一女子荷一铤形器，此四人之傍有大犬二。此后四人肩舆一乘（已缺其大半），后随一男子，其手所执之物不明。又四人肩舆一，舆中坐女子一人，舆傍有小女子一人随侍。肩舆后男子一人，右手执一物，一犬向之。其后一女子头顶一巨盘。其后又一肩舆与前肩舆同。肩舆后有男子二人，前者执杖。其后有女子二人，后者头顶一筐以左手扶之，筐上置一盘形器。后随一小女子，再后为四人肩舆一乘（图一，2）。

① 此处似应称“步辇”。《韵会》说：“世称辇车为步辇，谓人荷而行，不驾马也。”又班固《西都赋》（见《文选》卷1）中说：“乘茵步辇，惟所息宴。”李善注引《汉宫仪》说：“皇后婕妤乘辇，余皆茵，四人舆以行。”情形与此有些相似。步辇之制不知起于何时，不过先秦文献中似未见（？），其源或为南方。又按：“肩舆”古亦称“平肩舆”，《晋书》卷80《王献之传》言：“尝经吴郡，闻顾辟疆有名园，先不相识，乘平肩舆径入……”即是。其制大概有如现今南方之“兜子”，四川之“滑杆”，两人抬以行。本文中仍从《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》称“肩舆”，以便参照。

② 《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》20页“铜犁”及图版伍、陆。

③ 《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》78页，“7.铜鼓形铜贮贝器（M12：2）”，及图版壹贰貳。

④ 此两器所出的墓，同属于第Ⅰ类型，时代约为西汉中期。



图一 贮贝器上镌刻的图像
1. “上仓”(M12:1) 2. “祈年”、“播种”(M12:2)

这两种行列的进行及其活动是十分相似的。自其内容看，除了以播种仪式来看它以外，似乎没有其它较适当的解释。每年在播种以前，须先举行一次仪式性的播种，这在古代农业民族中差不多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过程。在有些地方一直保留到封建社会之中，如中国从前封建帝王的“亲耕”和皇后的“亲桑”，即是这种风俗的遗留。滇族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民族，他们有这种仪式，是可以预料的。

倘若我们把上面的活动认为是一种播种仪式的话，那末，祭铜鼓的意义就容易得到解释了。这并不是单纯的祭铜鼓，大概是一种“祈年”的祭祀，所以不仅其牺牲为女子，而主祭者亦为女子。故在一边为“祈年”，一边为前往“播种”，构成一整个程序。

在初级农业民族中，“祈年”是一种普遍而必要的典礼。特别是用人作牺牲，在古代民族中，非系有关他们生活的最主要的部分外，是不轻于举用的。再者，在许多原始民族的信仰中，只有用人的血才能恢复地力，使农作物得到丰收，所以不惜用各种方法去找寻祭祀的人牲。

若是我们认为此是一种祈年的仪式，则另外几件鎏金铜扣饰上所铸的人物活动场面，亦可附带地得到说明。

二 “孕 育”

在石寨山出土铜器中有三件被称为“人物屋宇镂花铜饰物”者，其上铸有相当复杂的人物活动场面。此类“铜饰物”均系木器上的装饰，故其后均有扣形凹，可以插于木器之上。木器已朽腐，故仅留下此类铜质的部分。此三件分别出土于墓3（64）、墓6（22）和墓13（239）。此三墓在发掘报告中认为系西汉中期的墓葬^①，也是殉葬品最丰富的三座墓。此三件“铜饰物”上所表现的人物活动的场面，虽有繁简的不同，但大体上则相类。

铜饰M3:64（图版贰拾，3）和M6:22（图版贰拾，2）两件的布局皆系自平地用巨木桩建一平台，台高约与人齐（以铜俑作比例）。台周有栏楯，前有阶梯以备上下。台后边建一屋宇，亦为木建筑。屋脊的两山向外突出，其下各挂牛头一个。屋有墙，正面中间开一小窗，窗中供一人头。窗外台上置一圆形器。如铜饰M3:64的平台上坐有二十余人，男女均有，皆为滇族。平台右前立有男子四人，后曳三叉形长幅，双手举起，似在舞蹈。又平台前面梯左地上有四人在烹饪食物。平台上置有长案、壶及勺等

^① 墓3和13属于Ⅰ型墓，大概是属于武帝前后的墓。两墓中仅墓13出小半两三枚，而不出五铢。两墓中均出铜犁（共十一件）、铜锄、铜镰等。墓6属于Ⅱ型墓，时代当略晚，“滇王之印”金印即出于此墓中。此墓亦出铜犁（四件）、铜锄（两件）、铜铲（两件）。

器。平台正中有一犬，平台下及傍有牛、马、豕等家畜。

铜饰M6:22在布局上基本与前者相同，惟人物较少。平台前当梯处竖立一板，上宽下窄，上端靠拢屋檐，有一蛇蜿蜒而上。屋宇的前面小窗中亦供一人头。平台上立者、坐者约十一、二人。男女均有，皆为滇族。平台中间近梯处亦有一犬。台前地上有三人作烹饪食物之状，台下及旁边有牛、羊、豕等。

铜饰M13:239（图版贰拾，1）体积较前二者约大一倍，建筑较复杂，人物亦较多；但从人物活动的布局上看，大体与前二者相似，仅场面较大而已。

整个建筑为“干阑”式^①。平台的后部为屋宇，也即是此建筑群的主体。屋顶的两山再出小屋顶，其下以柱承之。右边山尖下又出一小凉台，中坐女子二人。屋宇的前面正中开一小窗，其中供一人头，自其后面视之，为一梳“拖髻”的滇族女子之首。

屋宇小窗前靠右置一大鼎，鼎中有勺。鼎前坐一人，右有孟，左置尊，右手高举。小窗左置一大釜，其傍坐一人，当为炊釜者。

屋宇的前檐下，窗左坐三人，右坐一人，其前置案，并以双手料理案上的物品。案前右角亦坐一人，其首已失。

屋宇之右边柱后，有二人似在立而交合。

平台前地下立一牌，正对窗口，牌的上部已失。牌前立一犬，昂首而向阶梯。

屋宇的外右直出一长廊，正中又横出一短廊，其上皆有顶，周围无墙而有矮栏。长廊靠外缘坐男子一排，奏葫芦笙。横出的小廊中靠外缘坐男子一排四人，其后坐女子一人。

长廊前部较整个台面为高，其下立一马，首露于外。其前立男子三人，为首者吹葫芦笙，后一人以双手抚其肩，其后又有一人以双手抚后者之肩，似为舞蹈。

在平台的右前尚有敞棚二；台下有马、牛、豕等家畜。其它多残缺不明，不具述。

以上三铜饰所铸的活动场面，虽各略有微异，但在大体上是相同的。自其所表现的现象观之，大概亦为与农业有关的“孕育仪式”(fertility rites)之一。按照若干古代和原始民族的信仰，必须每年举行仪式使土地恢复其孕育力，否则农作物即不能萌芽生长。这种意义，可由几方面推之。

屋宇小窗中所供之人头，应为一种牺牲。台上之男女杂沓，笙歌乐舞，以及各种食物的准备，皆系所以悦之者。其仪式及意义为对于所猎之头的供养^②。

铜饰M13:239上有在仪式中交合，此亦为孕育仪式中较普遍的动作，在解放前西南

① 即《魏书》卷101《蛮獠传》所言之“依树积木，以居其上，名曰干阑”者。此种“干阑”式建筑为西南少数民族中较普遍的建筑形式，一般其上居人，其下圈畜。

② 按“猎头”的风俗，在东南亚分布颇广，其原因有数种，而“农业祭祀”仅为其中的一种，可参看A.C.Haddon：《南洋猎头民族考察记》(Head-hunters, Black, White and Brown)，商务，1937年，351—362页。

各民族中往往有之。此种遗意即使在以前中原地区亦所不免。例如宋释文莹《湘山野录》卷中载一则云：“冲晦处士李退夫，作事矫怪。携一子游京师，居北郊别墅，带经灌园，持古风以饰外。一日老圃撒园荽，即博物志张骞西域所得胡荽是也。俗传撒此物，须主人口诵猥语，撒之则茂。退夫固矜纯节，执妻子于手撒之，但低声密诵曰：‘夫妇之道，人伦之始，’云云，不绝于口。无何客至，不能讫事，戒其子使毕之。其子尤矫怪于父，执余子咒之曰：‘大人已曾上闻。’皇祐中，馆阁遂以为雅戏。凡或谈话清淡，则曰宜撒园荽一巡。”

此虽作为一谐謔而记之，亦可反映当时农业中的一种风俗信仰。至于这类事实在各原始民族中的例证，则不在此具引了。

再者为此类图像中的“蛇”的解释。蛇的形象在此类图像中颇多，例如铜饰M 6:22中台前牌上有一蛇，又如铜饰M13:239台前亦有一残牌，因其上段已残缺，其上是否有蛇如铜饰M 6:22者，已不得而知。铜饰M 3:64亦似有残缺，是否有如M 6:22者，亦无从推知，但可能相同。因为在祭祀中的“铜柱”上缠绕着有蛇（见贮贝器M12:26；图版貳，2），《报告》遂认为蛇是滇人的图腾。不过这种解释，尚待商榷。

从各种图像中对于蛇的表现来看，蛇在滇族中，大概系“土地”的象征的动物。例如双人盘舞铜饰物（M13:38；图版拾肆，1），二人所踏者为蛇，其他人物和动物之踏于和立于蛇上者，一共不下二、三十件（《报告》图版柒肆至捌伍中的各图）。以此种情况观之，蛇非图腾而是“土地”的一种象征，似乎是很明显的。

在古代和原始民族中以蛇象征“地”、“蕃殖力”、“女性”或“阴司”等等，是常见的，特别是在温带地区，蛇的活动与季节的循环是相符合的。在春天万物发生时蛇就开始活动了，到冬天植物枯槁时蛇亦入地而蛰了，所以人们往往以蛇来象征“地的蕃殖力”。例如印度的地力蕃殖女神Ellamma或其化身Matangi，均附以蛇的象征^①。再者，因蛇出入于地中，故蛇往往具有与“地府”（chthonic）有关的性质。另一方面，在原始的神话和传说中，蛇又往往与女性相联系。不过从石寨山发现的各种实物中观之，“蛇”可能与“地”或“地的蕃殖力”有关，故在农业祭祀中，往往以之作象征。又因其为“地”的象征，故在各种图案中，人物和动物往往皆踏于蛇身之上。

对于蛇的尊崇，在当时的云南，想必系一种很普遍的信仰。如《东观汉记》卷12《梁冀传》中说：“永昌太守铸黄金蛇献之冀，益州刺史种嵩发其事。”此虽未言明铸蛇的意义，但以金铸蛇而不铸它物，其对于蛇必有一种特殊的观念。

当然，此不过是一种解释，但无论如何，似乎比“图腾”的解释较为适合。因为若以蛇为滇人的图腾，在许多有蛇的祭祀图像中，则为一种“祭图腾”或“祀祖先”的祭

^① 参看James Hastings, 1d, Encyclopa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, Vol XI, p. 416.

祀了，其意义已经不大；而对于其它踏蛇的图像则就无法解释了。

三 “报 祭”

滇族在农业上不仅有“祈年”的仪式，而且亦有“丰收”的仪式，即我国古代所谓“报祭”。例如墓 1 中出土的一个铜鼓形贮贝器，其盖上铸有所称“祭铜柱”的图像①。在此圆径约 30 厘米的器盖上，除铸有铜柱、铜鼓之外，尚铸有高约 3—4 厘米的立体人物五十一个。在此小小的面积上，各人物的布置，骤视之似觉杂乱，而实际上却井井有序（图版貳，1。此图像复原中，有一些错误，肩舆中女奴隶主像被反置，肩舆的杠杆及抬法的复原错误，应依照本文图版的肩舆复原）。

盖面前半中间靠左立一铜柱，高约三人（以俑的高度为比例），柱圆形，下为础，础高约半人。础上所蟠者是否为蛇，因不甚清晰，不能肯定。柱身则有二蛇缠绕，柱顶立一虎。

柱之右立一牌，一人裸身反接缚于牌上，发则上绕牌顶而系于牌后，乳甚大，当为女性。其前右坐一人，左足枷于足枷中。其前一人裸身反接跪于地。此三人大概为祭祀的牺牲者（图二）。

铜柱与牌之两侧各置大铜鼓一面。铜鼓和铜柱与牌之后列坐四排滇族女子，前面两排每排四人，后两排每排三人，排列整齐。前三排各人膝前皆置有系之筐，筐中盛物。第四排每人旁所置者形似束薪，但可能是收获物。一排与二排之间立一男子，右肩披巾，双手按于胸前，作察视之状。

此四排列坐（坐皆箕踞——即南方的坐法）者之左，靠器盖的边缘又列坐女子四人，各人膝前置筐，筐中盛鱼肉等各种食物。列前立一男子，作视察之状。

此四横列、一直列之间，一女奴隶主乘四人肩舆前进，其后随女子二人，手中似皆持有物，但残缺不明。舆后一男子傍随，左手伸出，右手执一物似杖，但弯曲。此乘肩舆之女奴隶主可能为主祭者。

以上所述为其中之主要者，其他各人的动作此处不赘②。

此一活动场面，自其表面视之，似以祭铜柱为主要现象，所以在《报告》中，即以为“此盖上所显示的内容，不能是一种祭祀的仪式，铜柱或为他们信仰的图腾……”的说法③。此系一种祭祀仪式，则是肯定的；若以为铜柱为滇人的图腾，则似乎与实际情

① 云南省博物馆：《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》，《考古学报》1956年1期，55页，图版伍。

② 以上所述者均为滇族男女，其旁观者中尚有其他种民族，如左面铜鼓后即有编发如拙著《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》中所举之 E 组者等。

③ 同①，55页。

况不合。因为此中之“主祭者”，及绝大部分活动的人均为滇族女性，男性仅处于辅助地位。滇族当时已非母系社会，自不能以女性来祭图腾了。此一祭祀的内容，很明显系一种“丰收”或“收获”祭祀(harvest festival)。铜柱后各列女子前筐中之物及所执之物，皆当为新收获之农作物，其主祭者为女子，亦与“祈年式”中者相同。

祈年与秋收，皆为农业民族中最主要的祭祀，一所以“祈”，一所以“报”，故皆用人作牺牲。

祈、报的仪式，在所有的农业民族中都有其遗留，在汉族古代亦为最重要的祭祀，文献过多，此处不具论。即至宋代，陈旉所著的《农书》，其中除论述诸农事蚕桑外，特著“祈报篇”以论其重要^①。滇族主要为农业民族，报祭自为必然之举。

如果前面所推测者为正确，则滇族有一系列农业仪式，从“孕育”、“播种”到“收获”等都举行隆重的典礼，以保证禾稼的生长。滇族的农业作业，大概均由妇女任之，故在此等仪式中，不仅主其事者为女子，而其中大多数之活动者，亦均为妇女。再者，在孕育仪式中，窗龛中所供者，为一滇族女子的首级，但不知是否代表一种“禾稼女神”，有如亚齐克人(Aztecs)中的“玉蜀黍女神”(Maize Goddess)一样^②，不过其情况是很相似的。如在其前宴乐歌舞，似有以娱之者。如果其非神的代表，此等举动，似不可解。因原始民族的信仰，禾稼之神年须一人的牺牲，以恢复其活力。亚齐克人之“玉蜀黍



图二 贮贝器(M1) 盖上杀人祭铜柱场面

① 现在中国的“中秋节”，北美的“感谢节”(Thanks giving day)等，皆可以视为系“报祭”的遗留。现在苗族中的“吃新节”更是最隆重的节日，每于秋后举行。其最近通俗的报道，曾见于《光明日报》1962年8月23日第一版，《黔东南清水江沿岸苗族人民欢度吃新节》。其他西南少数民族中均有这种节日，如侗族中的“花炮节”、景颇族的“吃新谷”等等，其起源均甚古。

② 关于亚齐克人的玉蜀黍女神的奉祀，可参见Sir J.G.Frazer, *The Golden Bough* (abridged ed.) , 1930 pp.589—591.

女神”是如此，而古代罗马之沙特恩（Saturn）^①农神亦是如此。

四 “上 仓”

滇族的农业直接生产活动，在各种活动场面中无所见，贮贝器M12:1上所刻的“上仓”活动，亦是颇有意义的。这一图景在《报告》中作为“领粮之图”（《报告》77页，图版壹貳壹）。不过细察此一图景，在《报告》的图版中对其分割似尚可商榷。因此为一圆形器，图景刻作一圆圈，视之似连环图画，且又部分破裂，从何处分割，则当细察其内容和布局。兹将其分割如本文图一，1所列，其意义似较明显。

此图分为两部分，但均为从临时堆粮的地方将粮运入仓库。其右部一组，最右边为仓库，木建筑，四壁用巨木纵横镶成。仓库底为巨木板，距地三木，以避潮湿，前面有短梯以备上下。仓库顶为木板，其形式与其它铜铸像房屋相同。

左边为编织的临时堆粮的囷三，粮皆贮于编织的小袋中，自上系之，形如大罐。前一排十人，皆为妇女，最后一人正将粮袋自囷中取出，置于地上。其他九人皆头顶一袋或两袋往仓库运送，其最前一人已将粮卸下交与管仓库的男子。后一排九人，亦皆为女子，其中六人头顶筐，二人各手执一圆圈，另一人所执不明。此种圆圈，或者系置于头顶以承筐者。此一排皆往临时的囷中取粮者，其最前一人正从囷中将粮一袋一袋的取下置于地下筐中。

左部者与右部者在组合上大体相似，其最右为木建仓库，形式与右部者相同，惟屋脊部分已断失。其最左为编织的圆形的囷。在仓与囷之间，有妇女两行，每行十一人，自囷运粮至仓库。仓库的梯上立一男子接最前一人所运至之粮，其右有一女子亦如之。两行之最后一人，各以手自囷中取粮袋以备运走。

此为禾稼收获后上仓的最生动的图景，此图景所描写者虽然是一种实际情况，但亦可能带有仪式的性质，以表示奴隶主的粮食的丰富，故将其刻绘于铜贮贝器之上^②。

① 恩格斯：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55年，48页。恩格斯说：“其时在一个短期间重新恢复旧时的自由的性交”一层，是与铜饰M13:239的情况相合的。按沙特恩为古罗马种植和农艺之神，其庆祝在罗马历十二月，是时各种阶级、礼教、禁制等等完全解除，甚至主、奴易位。每年选一貌美的青年以饰农神，在一月之内事之如王者，任其享受，至节日则将其为牺牲。可参见Sir J.G.Frazer, op. cit, pp.583—7, “The Roman saturnalia”。

在中国方面，西门豹令邺时之“河伯娶妇”（《史记》卷126），李冰守蜀时之“江神娶妇”（《水经注》卷33），可能皆为此类风俗的遗留。其他如古代希腊亦有每年将一奴隶投入海中作人牲（human scapegoat）者。

② 按现在云南的景颇族中，除了“吃新谷”的仪式之外，还有“献谷堆”的仪式（参见朱华、李应川：《景颇族》，《民族团结》1962年8月号，46页），但其详情则不明。